

非法物質施用青少年之 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初探

蔡佩真

壹、前言

青少年涉入於違法物質的現象日益嚴重，近年K他命、咖啡包和俱樂部毒品、各種變形包裝的違法物質滲透在青少年生活圈中，楊士隆等人（2017）調查2016年臺灣地區校園學生非法藥物使用之盛行率，有1.4%的學生曾使用任何一種毒品，K他命占41.46%為第一，咖啡奶茶毒品混合包占21.95%次之，K他命是當前臺灣地區中學生藥物濫用之首位。衛生福利部（2018）的統計顯示29歲以下青少年濫用的藥物是以K他命為主，校園中的藥物濫用也以K他命等類的第三級毒品為主。三四級毒品的社會危害性表面上似乎不如一二級毒品，但是青少年一旦涉入使用，進而可能導致生活失序、失學、接觸更複雜的族群，甚至涉入偏差違法的險境。

因此政府以反毒作為建立完整社會安全網的第一步，對青少年施用毒品高危

險族群進行干預，強化對施用第3、4級毒品兒少及家庭輔導。然而臺灣過去的研究對於非法物質施用青少年的成長經驗以及家庭生活的探討較少，對於非法物質施用者家庭的親子關係以及管教方式也鮮少探究，父母與子女互為重要他人，無論親子關係的本質是如何，這份關係總是深深地影響著子女一生的身心發展以及彼此的幸福感，涉毒青少年的家庭經驗需要被了解與重視。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2009）分析出與物質施用有關的家庭危險因子包括：與父母關係不穩定或不安全、缺乏與主要照顧者的親密關係、家庭教養不力、家庭環境混亂、父母或手足涉毒、心理疾病或有犯罪行為、社會孤立；反之，與家庭有關的保護因子則包括：親子間有安全而健康的依附關係、父母參與子女的生活、父母能監督和有效的管教、傳達正向價值觀、父母對子女提

供情感、認知、社會和經濟上的支持性照顧。此外，UNODC 認為親子互動與子女問題行為之間有循環性，當親子關係缺乏安全、規則、信任、溫暖和約束，就有可能形成子女的問題行為；而若當父母疲於處理子女問題行為或用藥問題時，又會影響他們的教養能力，相互影響，環環相扣。

家庭功能和父母支持是預防子女物質使用和濫用的保護因子（Cordova et al., 2014），而涉毒的青少年在他們尚未使用違法物質前，究竟所經驗到的父母管教和親子關係的樣貌是如何，青少年的物質施用與父母管教、親子關係的緊密關係需要進一步去探索和理解。本研究擬透過對非法物質施用青少年以及其父母親進行深入訪談，以探究實況，研究的初步結果希望能幫助實務工作者提供必要的處遇。

一、親子關係之內涵

親子關係的內涵可分為二大面向：第一類是溫暖與支持的正面關係，第二類是控制與衝突的負面關係，溫暖與支持的親子關係是指親子之間的接納、尊重、鼓勵、讚賞與關愛；而控制與衝突的親子關係則是威脅、漫罵、忽視、責打等（周玉慧，2015）。李美枝（1998）認為華人家庭的親子關係不外乎「情」與「權」，情與權分別對應溫暖與支持以及控制與衝突二類型的親子關係。

周玉慧（2015）於2000年至2011年之間長期追蹤臺灣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親子關係特色，其研究結果顯示各時期親子關係均可分為「矛盾型」、「支持型」、「衝突型」及「疏遠型」，矛盾型是支持高與衝突也高，支持型是支持高且衝突低，衝突型是支持低且衝突高，疏遠型是支持低與衝突低的關係，此四類型在不同時期的比例有所變動，成年初期的變化最為明顯。本研究也根據此四類的青少年親子關係的性質來觀察青少年在涉毒之前與父母的關係，並同時藉由家長與子女的觀點與文本來進行分析。

二、父母管教與子女使用非法藥物的關連性

促使青少年施用違法藥物的危險因素包括與父母及家庭相關因素（Mack et al., 2016），而其中父母因素則包括：缺乏對父母的親近或依附、父母少涉入子女生活、父母欠缺對子女適當管教、父母使用違法物質、父母對物質使用的信念和態度、父母對物質使用行為的忍受（Bukstein & Kaminer, 2015）。所以，父母管教與子女使用非法藥物之間有很大的關連。

Baumrind（1991）以不同程度的溫暖與控制兩個變項作為框架，來區分出四類型的教養方式包括：權威式、獨裁式、縱容式、疏忽式的教養方式。以下簡要敘述其內含與對子女的影響。

（一）獨裁式（Authoritarian）

獨裁的父母是少溫暖、高控制，其控制的得分高於第50百分位數，溫暖的得分低於第50百分位數。父母對子女要求較高，常採用懲罰的管教方式，要求子女服從命令，卻不解釋，控制子女，給極少的溫暖。獨裁式教養下的孩子容易有社交困難及低落的自我形象，有較高的個人困擾和較低的學校表現（Calafat et al., 2014）。此外，過度嚴厲的管教常影響到子女日後的生活適應，有些研究顯示孩童受到嚴厲管教或以虐待方式來管教者，較易出現問題行為，例如：犯罪、精神疾病、學業不佳、同儕相處困難、物質濫用（Simons et al., 1988; Wolfe, 1987）。

（二）權威式（Authoritative）

權威式父母的管教結合了溫暖和適度控制，其溫暖與控制的得分都高於第50百分位數，提供子女明確的規則和標準，也會向子女解釋理由，父母鼓勵子女溝通並表達自己的決定，鼓勵子女獨立自主。父母給孩子溫暖以及參與機會，即使子女未達父母期望，父母寬容而不懲罰。來自權威式管教的孩子酗酒比例較低（Bahr & Hoffmann, 2010），物質濫用比例也較低（Montgomery et al., 2008）、較有責任感、可靠、有較好的心理能力和適應力、在行為和心理方面的問題也較少（Lamborn

et al., 1991），也有較好的學業表現（Im-Bolter et al., 2013），一些學者認為權威式管教是最佳的管教方式（Montgomery et al., 2008）。

（三）縱容式（Indulgent）

父母多溫暖、低控制，會與子女溝通，但子女不順服時就遷就子女，少有要求，不執行嚴格的規定（García & Gracia, 2009）。這種管教方式使子女有相對較低的自我控制。社交良好，受朋友歡迎，但成績低落，也易出現行為問題。有些研究結果發現，縱容式家庭的青少年自我認同感很強，但在藥物濫用方面，還有在校的不當行為的比率很高（Steinberg et al., 1994）。但Calafat等人（2014）的研究卻發現縱容式管教的青少年有較高的自尊與學校表現，且優於其他三種管教者的子女。

（四）疏忽式（Neglectful）

父母少溫暖、低控制，沒有給子女溫暖和控制，少與孩子相處，不太教養子女。疏忽式教養下的孩子普遍出現不佳的學業成績和嚴重的行為問題，外顯行為表現都比較差（Calafat et al., 2014）。

父母的教養方式會影響青少年藥物濫用與外顯行為表現，美國研究發現來自權威式管教的孩子酗酒比例較低（Bahr & Hoffmann, 2010），英國研究發現權威式管教的孩子物質濫用比例也較低

(Montgomery et al., 2008)。歐洲的研究方面，Calafat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權威式教養和縱容式教養的子女有較低的藥物使用比例，而疏忽式教養和獨裁式教養則有較高比例的菸草和非法毒品的使用，而且，獨裁式教養方式的酒精使用比率高於疏忽式教養方式。此一大型研究結果發現，在歐洲地區，縱容式教養方式與權威式教養方式都可保護子女防範青少年子女使用非法物質。父母溫暖的教養方式無論是對於藥物預防或是個人困擾的減低，都具有正面的結果。

教養方式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最佳的教養方式與文化背景有關(Calafat et al., 2014)，最佳教養方式也與社經地位以及社會情境有關(Kazemi et al., 2010)，在南美的巴西或南歐的西班牙，嚴格、控制、懲罰的作法被認為是一種負面的教養方式，他們盡可能地以溫暖、情感的方式支持孩子(García & Gracia, 2014)。但華人文化則是不打不成器，愛之深、責之切，本研究希望能藉訪談涉毒少年的家庭來探究華人家庭在子女涉毒以前的管教與親子關係。

三、華人家庭的親子關係與子女使用非法藥物的風險

華人家庭強調上下、尊卑、控制與支配的關係，時至今日，這種關係法則仍然隱隱影響著華人家庭的親子關係，臺灣民眾認為父母對子女必須表現關愛與尊長

的風範，並有權支配子女的一舉一動(蘇詠絮等人，2013)。葉光輝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強調角色階級與權力關係仍是現今華人家庭中關係結構的重要特徵。所以在管教上，華人父母比西方父母對子女有較高的控制(Chao, 1994; Wu et al., 2002)。

在這樣較為掌控的文化脈絡下，臺灣有零星的研究呈現出青少年藥物使用的危險性與管教的相關性，父母管教過嚴或漠不關心會增加青少年施用毒品的危險性；不被父母親信任者，其藥物使用之危險性高出3.1倍；父親不民主的管教態度比民主的管教態度，其子女藥物使用危險比為2.9倍，母親不民主的管教態度比民主的管教態度，其子女藥物使用危險比為3.9倍(周思源等人，2006)。

而早期程玲玲(1997)研究臺灣海洛因藥癮者的家庭及其成長經驗，發現48%的受訪者受到父母一方或雙方的過分寵愛，關係過度糾纏不清。上述二篇是少數提及用藥者與父母親子關係的文獻，這主題的本土研究還是相當稀少，非法物質施用家庭親子關係的資訊相當片段與薄弱，亟需更多的探究。

貳、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

本研究屬探索性質，過去研究親子關

係時，親子配對資料不易獲得，大多數只能採取親方或子方的單一觀點，但親子對於彼此關係的知覺常有出入，雙方一致性不高（Aquilino, 1994）。因此僅憑親方或子方單一角度的理解並不足夠，同時考量親子雙方的知覺，才是較完整的視角，因此本研究為了得到較完整的圖像，研究參與者為涉毒青少年及其父母，研究策略為進入其家庭實地訪談與觀察，並分別進行父母與非法物質施用青少年的訪談，讓受訪者回顧在子女涉毒以前的管教與親子關係，以建構對於藥物使用者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及父母管教的了解。資料蒐集與分析是透過有系統的實際研究資料蒐集、分析整合而建構概念，資料分析是參照受訪者的陳述，由研究者根據文獻所定義的「管教方式」、「親子關係」特徵，逕自將受訪者予以歸類。

在確保分類的效度方面，研究者具有多年實務經驗與熟練訪談技巧，並透過家庭訪視的近距離接觸與觀察、長時間深度訪談，來確保資料的真實性。其次在進行編碼時，對於各項分類也進行助理與研究者的多次共同討論以查核與確認分類的適切性。也採用受訪者的文本證據來支撐分類的效度。

二、研究參與者與選取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 K 他命施用青少年本人及其父母，選樣方法為立意抽

樣。由於 K 他命為時下青少年使用比例較高的物質，物質濫用者習慣多重藥物使用，但還是有主要的用藥偏好，因此訪談包括 K 他命施用者的父或母及其涉毒子女，樣本來源是透過機構介紹，父母共訪 10 人，以 KF1-KF10 為代號，其非法物質施用子女共訪到 7 人，以 K1-K7 為代號。為了達到研究現象的多元樣貌，樣本選取時考慮以下原則：父母性別、用藥子女性別、父母的社經狀況、家庭管教功能。研究對象選取的考量標準與家庭特徵配額如表 1。

受訪的十個家庭的非法物質施用子女有 3 位女性、7 位男性，開始使用違法物質的年紀有五位在國中時，四位在高中時，一位是 20 歲才開始，成癮時間平均為 7.3 年。他們受訪時年紀從 19 歲到 33 歲之間，平均 24.8 歲，均未婚。訪談的經驗範疇是聚焦於回顧他們青少年時代未涉毒前的親子關係與家庭管教。

參、研究發現

一、受訪家庭特質

受訪父母性別上，10 位家長當中有 2 位父親、8 位母親；在家庭結構上，5 個家庭是生親家庭，2 個繼親家庭，3 個單親家庭。十位用藥少年中有 2 位經歷喪父，2 位經歷父母離婚。父母的社經狀況方面，其中有 2 個家庭較為拮据（KF2、10），有 4

表 1 立意抽樣標準與樣本數

家庭特質 \ 涉毒子女性別	男	女	小計
受訪父母性別			10
男性	2	0	2
女性	5	3	8
父母社經			10
高	3	1	4
中	3	1	4
低	1	1	2
家庭結構			10
完整	5	0	5
缺損（離婚或喪親）	2	3	5

註：左方清單為立意抽樣之選擇標準，右方空格為實際訪談人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個家庭是小康（KF3、4、8、9），3個社經狀況佳的家庭（KF1、5、6），以及1個極其富裕的家庭（KF7），整體的狀況看來，受訪的家庭物質環境良好，家裡也大致能供應子女成長所需資源。

居住環境方面，研究者逐一家庭訪視的過程也特別檢視受訪之物質施用者居住的社區與住家環境，十個家庭分別有四位家庭位於臺北市（松山區、大安區、內湖區），六個家庭位於新北市（土城區、新莊區、新店區、蘆洲區、五股區），都是交通便捷、人口稠密，捷運及步行方便易達的地點，有幾位受訪者所居住的社區是高級住宅區，也有居住於清幽的文教區，

或是古樸的老社區，K他命施用者的家庭並沒有脫離一般家庭的日常樣貌，絕大多數的家庭依然很努力打理家庭環境，即使家中有孩子施用非法物質，其他人家人仍然希望維持常人的家庭舒適感和清潔度，家庭擺飾也呈現家人的用心。

二、子女涉毒前的居住狀況

子女使用非法物質之前是與家人同住者有七位，包括K1、K2、K3、K4、K5、K6、K8，除了K5的父母很努力照顧子女的生活所需，其他五位與家人同住的生活樣貌並不理想。K1因為是單親家庭，母親忙於工作，無法在家陪伴子女，

K2則是父親有嚴重的酒癮與家暴狀況，住在家中甚感恐懼和無力。K6在家也是受虐兒，會離家出走，覺得朋友家溫暖自在。而K4雖與父母同住，但因加入幫派，父母管不動，最後只能放任。

有三位青少年在他們涉毒之前是無法與父母同住，三個來自單親的青少年從小常常是自己一個人生活，或者是被安排在不同的親戚家過生活（K9），抑或是被迫住在學校（K7）、被迫獨自租房子在外居住（K10）。涉毒青少年對於自己必須孤獨面對生活，無法被妥善保護和照顧而對父母有所埋怨和怨恨，覺得不被愛，沒有被照顧到。當研究者詢問K6關於以前一起用藥朋友的家庭狀況時，K6的回答描繪出涉毒兒少的家庭狀況並不理想，「其實就一、兩個是很好，家裡非常好過，然後其他大部分就都是不怎麼好過，不然就是單親，就是一下跟爸爸住，一下跟媽媽住，對啊，後面就不回家，就跟我們在一起住這樣，對。可是有一個也是跟我家很像，就都有爸媽，然後家裡非常好過，很有錢，只是他爸媽也不懂他，我只知道說，他爸媽跟他不好」。

三、家庭之親子關係

用藥青少年的父母在教養方面經常有漠視或不一致的現象（吳齊殷、高美英，2001），因此討論父母與涉毒子女的親子關係時，應就父親與母親不同角度進行分

析。此外，Seltzer和Ryff（1996）也認為青少年的母子關係與父子關係的特徵並不相同，母子關係的基礎是親密與衝突，而父子關係的主要特徵是引以為傲與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分析是將父母二方的親子關係分開來探討。

本研究根據周玉慧（2015）所分的四個親子關係類型來觀察受訪家庭，採用本研究的訪談文本來進行歸類，四個親子關係類型是根據支持與衝突來加以組合，其中「矛盾型」是指支持高與衝突高，「支持型」是指支持高且衝突低，「衝突型」是指支持低且衝突高，「疏遠型」是指支持低與衝突低的親子關係。根據周玉慧等人（2010）的定義，「支持」的內涵指涉父母對子女或子女對父母的讚賞、鼓勵、接納、尊重與愛；「衝突」的內涵則包含責打、威脅、叫罵及忽視等互動行為。

子女施用非法物質前的父子關係如下：

1. 疏遠型：支持低且衝突低，本研究中這類的父子關係最多，六位涉毒子女包括K8、K3、K4，以及失去父親的K1、K10、K9。
2. 衝突型：支持低且衝突高，分別是K6、K2。
3. 支持型：支持高且衝突低，分別是K5、K7，二位的父親相當關愛與重視孩子的需要。
4. 矛盾型：支持高與衝突高，目前未有受訪者屬於這類父子關係。

而子女施用非法物質前與母親的關係如下：

1. **矛盾型：支持高且衝突高，本研究**
中這類母子關係最多，包括K4、
K5、K8、K7、K6，母親與子女關
係非常緊密，但是常有衝突。
2. 疏遠型：支持低與衝突低，分別是
K3、K10。
3. 衝突型：支持低且衝突高，K9屬
於此類，母親改嫁後，未成年的
K9自己獨居，仇恨母親。
4. 支持型：支持高且衝突低，分別是
K1、K2。

從以上的歸類可以看出父子關係偏向於負向，最明顯的是「疏遠型」，其次是「衝突型」，父子關係較少具有正向支持與滋養。而母子關係的部分，最多的是「矛盾型」，母親與子女的關係多半緊密，但是相處上的衝突張力時有所見。母子關係也出現疏遠和衝突類型，造成雙方的痛苦。本研究的發現與周玉慧等人（2010）的研究成果一致，該研究發現青少年對於母親呈現「又親又悖」或「緊密又緊張」的矛盾知覺，大多數的母親只感受到子女對自己缺乏支持與衝突不斷等負面的感受，角色壓力很大。

以下採用一個受訪的母親（KF6）及他們的用藥兒子（K6）的訪談來呈現「疏遠型」父子關係的實況。這位母親提到「因為我先生沒有什麼耐心，孩子只要一

哭，孩子只要需要照顧，或是孩子需要陪出去玩，他都完全沒興趣陪伴，所以我是一個有一點辛苦的媽媽……在那當中就是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先生一直跟我孩子很不親……**我先生不喜不善於跟孩子聊天」（KF6）。他們的兒子K6因為未成年用藥加上暴力傷害，而被保護管束和安置中，兒子受訪時也提到「我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跟我爸都沒有什麼講話，都沒有講話啦，幾乎是沒有講話啦，很長，大概半年吧，半年、一年。就是簡單的問題這樣子，沒什麼講話，對啊。我爸回來就看電視，或玩電腦，然後就這樣問候，就進房，就沒有什麼講話就對了」。（K6）

四、家庭之管教方式

本研究根據Baumrind（1991）的四個管教類型來分析受訪家庭在子女濫用違法物質之前的管教方式，並根據其訪談內容來進行歸類，詳見表2，四個管教類型分類依據如下：

1. 權威式：是溫暖且適度管束，提供子女明確的規則和標準，也向子女解釋理由，鼓勵子女溝通並表達自己的決定，鼓勵子女獨立自主。給子女溫暖以及參與機會，父母寬容而不懲罰。
2. 獨裁式：是少溫暖且高管束，父母對子女要求較高，常懲罰子女，要求子女服從命令，卻不解釋，控制

子女，給極少的溫暖。

3. 縱容式：多溫暖且低管束，父母遷就子女，少有要求，不執行嚴格規定。
4. 疏忽式：是少溫暖、低管束，少與孩子相處，不太教養子女。

本研究的子女濫用違法物質前，父親的管教方式如下：

1. 疏忽式（不涉入式）：屬於少溫暖、低管束，本研究中這類的父親管教方式最常出現，包括K3、K8、K4，及父親在成長中缺席的K1、K9、K10。
2. 獨裁式：少溫暖、高管束，K2、K6的父親都非常嚴格管教，甚至

嚴厲體罰。

3. 權威式：溫暖、適度管束，K7、K5的父親盡心竭力的照顧與呵護子女。
4. 縱容式（放任式）：多溫暖、低管束，本研究未有父親屬於這類管教。

本研究的子女濫用違法物質前，母親的管教方式如下：

1. 疏忽式（不涉入式）：少溫暖、低管束，本研究中這類的母親管教方式最多，包括K3、K4、K5、K6、K9、K10。
2. 獨裁式：少溫暖、高管束，包括K7、K8、K4。

表 2 用藥者家庭特徵、管教方式、親子關係表

個案	家庭特徵	家庭結構	父母社經	管教方式		親子關係	
				父親	母親	父子	母子
K1		單親－喪父	高	疏忽式	縱容式	疏遠型	支持型
K2		生親	低	獨裁式	權威式	衝突型	支持型
K3		生親	中	疏忽式	疏忽式	疏遠型	疏遠型
K4		生親	中	疏忽式	獨裁式	疏遠型	矛盾型
K5		生親	高	權威式	疏忽式	支持型	矛盾型
K6		生親	高	獨裁式	疏忽式	衝突型	矛盾型
K7		單親－喪母	高	權威式	獨裁式	支持型	矛盾型
K8		繼親－離婚	中	疏忽式	獨裁式	疏遠型	矛盾型
K9		繼親－喪父	中	疏忽式	疏忽式	疏遠型	衝突型
K10		單親－離婚	低	疏忽式	疏忽式	疏遠型	疏遠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 縱容式（放任式）：多溫暖、低管束，包括K1。

4. 權威式：溫暖、適度管束，例如K2。

上述歸類可見到**子女濫用違法物質前，父母的管教方都是以「疏忽」為最主要的管教模式，其次是「獨裁式」的管教**。此一發現與Calafat等人（2014）的研究是一致的，該研究發現疏忽式教養和獨裁式教養則有較高比例的菸草和非法毒品的使用。

在這些管教模式下的子女大多呈現的感受是：對父母的愧疚（K3、4、5、10）、少了心靈支持（K3、5、6、9）、不被信任（K4、6、8）、不被了解（K3、4、6、9）、不被認同（K6、8、9）、又愛又恨（K6、10）、反感與無奈（K4）、感覺被愛（K5）。由於篇幅限制，以下只列舉幾個案例來呈現這些管教的樣貌與子女的感受。

K10，單親母親對她的「疏忽式」管教與「疏遠型」的親子關係，在她的成長中，母親的單親角色是混亂的，母親教她抽菸、喝酒、打牌，母女角色是顛倒的，「以前我都是跟媽媽講那種『欸，妳早點回來好不好』、『妳不要打牌好不好』、『妳不要抽菸好不好』，都是我在管她，以前她的朋友都會覺得說我還比較像她媽，然後甚至她在牌桌上，我打去催她回家的時候，她朋友都說：『妳女兒又

在催妳回家了』，就是那種角色是顛倒的喔」，談到母親的失職，K10還是很有情緒，「我有恨過她，因為我會覺得說：『妳都不管我，妳以前都不管……』，她以前都不管我的喔，從小到大她沒有管過我作業，沒有管過我交友圈，沒有管過我的一些生活瑣事，因為可能她也在忙，她就是錢丟了，人就不見了。甚至國中的時候，她去日本工作，我一個人住，一個國中生就一個人住耶。然後高中的時候，她又交了叔叔，她去叔叔家，就跟叔叔住在一起啊。變成……喔我前男友那時候還搬兩個很大的……差不多那麼高的那種兩個立體喇叭，就直接在我家，然後我們就很多朋友都是在我家，人家說的那種轟趴這樣，對啊，因為家裡面沒人嘛，那我隨時要出去，媽媽也不知道，所以晚上就是去舞廳賣毒啊」（K10）。

KF6提到先生「獨裁式」的管教與「衝突型」的親子關係，把兒子往死裡打，「我先生脾氣不太好，當我在指責我的孩子的時候，我先生不能夠忍受，他就會跳出來，開始就是就想要拿杖打他，或者就是罵他。然後他們的關係就會變得很不好，因為我先生就會用處罰的方式，有幾次我先生很生氣，甚至於把我兒子趕出家門，把他的東西都丟出去……其實他沒有犯到非趕出去不可的罪，只是我先生的情緒一來，他沒有辦法克制」（KF6）。

而他們的兒子K6對於父親的管教方式感覺到恐懼和怨恨，「他先罵，先吼吧，先罵再吼，然後再打，啊然後邊打邊罵，就是那一整個是一個程序的這樣，他就先罵，然後打。最常罵廢物吧，廢物跟……對啊，廢物……反正就是這一類的東西，然後跟他說對不起也沒有用，我爸是不會聽，不會聽我講那麼多東西啦，先打再說就對了。不溝通。……打得很兇啊，就是……（停頓三秒）……就是他那種感覺就是他打我的感覺要把我殺掉的感覺。我覺得他不是在管教我，我覺得他在發洩情緒啊。我現在想起來我覺得他在發洩情緒啊，但是我只知道他那時候讓我感覺就是說很恐怖、很害怕。他就讓我感覺他很恨我這樣子。他在生氣的時候眼睛就會紅掉，變……就感覺……嘖，我不會講，對啊，那感覺，很恨我這樣子。……我非常恨他，無解吧，不能原諒我爸爸，我覺得，就是心裡的那個還是過不去啊，我覺得我可以不要這個爸爸說實在的，沒有差，他沒給我什麼影響力，也沒給我什麼照顧」（K6）。

K4的父母跟他是「疏遠型」的親子關係和「疏忽式」的管教方式，「我就覺得其實有時候我在家裡面，這個家一點都不像家，我覺得是各做各的事，對，我到現在還這樣認為。……我爸就是什麼事都不講，就是我爸這點就跟我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就都不講的啊，其實依我

了解，他在工作或是生活上，其實他自己就常常很不如意了，所以，對，所以他有時候對我的事情，他其實不知道怎麼去管……我國中開始愛玩，到少年隊介入我的學生生活的時候，他們（父母）一路上都是給警察管、給學校管，他們都已經管不動了，每天看到你，你要不要去上課不關我們的事，可能他們下班回家五六點，我還攤在沙發上面，看到我穿著制服沒有去學校，他們不會講什麼，那時候其實我覺得他們這種放任式的，從以前小時候到現在」（K4）。

五、子女對教養的期待

本研究的涉毒青少年的家庭社經情況大多能供應子女的物質需求，但是有一半青少年的家庭結構缺損，經歷父母離婚、喪親、繼親、缺乏照顧者或常常更換住所、甚至獨居。他們與父親的關係多數是疏遠型，與母親的關係多數是矛盾型。在不快樂的生活中，少年尋找互相取暖的同溫層，也是一群家庭功能偏向缺損的青少年，一起尋找快樂。

「其實我覺得我就是缺乏被照顧吧，我覺得啦，因為我就怕孤單就對了，然後他們回來也沒陪我，就是看他的電視，然後叫我做功課，或是怎麼樣，所以我就覺得我，嘖，不知道，我覺得朋友比較重要」，「我反正國中就是變得很不開心啦，就自己一個人，或是就跟那群，其

實大家都是好玩，然後開心，我們家裡的感覺給我們感覺不開心，所以在一起吸毒很開心」。子女在年幼時多半無力反抗父母，但國高中後就會開始脫離控制，這孩子的母親說到「當他升入高中的時候，他就自己上學、放學，所以他好像就斷了線的風箏，他就開始就回來就越來越晚」（KF6），少年K6國三開始拉K，約三年多，他們的問題行為其實是用錯誤的方式來滿足需求，是一種求救訊號，毒品不是真正的問題，戒癮不是唯一的處遇重點，親子關係的修復與父母對於親職的學習才是讓子女願意回家的路。在這一段旅程中，父母對於親子關係以及自己的管教方式也有一些反思，就像KF4所提到「可能之前也有我們不了解，可能我們疏忽或什麼」。究竟青少年子女們需要父母怎樣的對待？

（一）關心、了解、肯定和安全感

在一番訪談回顧之後，K6很有感觸的說「其實，我覺得我只是要一個關心吧，對啊，讓我感覺說有安全感，我覺得我接下來就沒有安全感。在家裡，就我一直從小就被打，然後，感覺我做每一件事情都做不好，然後，感覺你們也不肯定我，對啊，也不了解我，然後我這樣哪會有安全感。……不喜歡回家啦。跟朋友在一起就會比較快樂」。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段話時，讓我們得以理解到

子女渴望被關心、了解、肯定和安全感的需要。

（二）渴望陪伴

本研究的子女們因為來自不完整的家庭，常常孤獨的生活，特別渴望被愛、有人陪伴，而且是有品質的陪伴，而非空間上的同在而已，「因為**我就怕孤單就對了**，然後他們回來也沒陪我，就是看他的電視，然後叫我做功課，或是怎麼樣……所以我就覺得我，嘖，不知道，我覺得朋友比較重要」（K6）。這孩子的母親在受訪時感到懊悔，「我們看不到孩子的需要，他可能會需要你多陪伴他一下，他可能有情緒，他可能當下有什麼，……我們沒有想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他，為什麼他會這樣？所以我覺得我的孩子其實他看出我們這塊的問題。……**其實我想一想我其實我真的很後悔，很後悔是我錯失了每一次可以跟孩子陪伴的時間**」（KF6）。

（三）渴望傾聽、理解與學習好好溝通

當子女遭遇困難時，親子關係往往需要更多的傾聽而非究責，未經了解事實的責備與說教關閉了溝通的門，「我覺得我跟她講事情、講祕密或講什麼心裡的話，她一次反駁我沒有關係，第二次反駁沒關係，到第三次我就不會講了，就是妳沒有辦法了解，妳給我的就是妳不是站在我這邊嘛，妳就是要唸我，那樣幹嘛跟妳講，

可見妳不懂、不懂啦，反正就是她會一直讓我感覺說，就跟妳講沒有意義啊，對，問題沒有解決啦」（K6）。所以父母的溫暖以及與青少年間的雙向溝通是重要的，特別有利於青少年心理優化，並防止偏差，溫暖與溝通是父母教養方式的重要關鍵（Calafat et al., 2014）。

（四）渴望父母調整期待

在親子關係理論中，「父母期望論」認為青少年子女常違反父母期望，因此父母必須因著子女的發展來不斷調整原來的期望，父母會產生內在衝突與情緒起伏，但隨著新期望的發展及重新建立的親子互動型態方能解決父母內在衝突。以典型K6為例，父母過度重視功課，過高的期待加上過度體罰而壓垮兒子，唯有調整期待才能鬆綁親子的緊張關係。

「我媽她就只在乎功課，所以我才說我那時候功課不好回家會被打，所以不太敢回家」（K6）。母親的說法則是「我一直希望他能夠在學制下好好的念書，我還一直希望說，他如果念到一半這樣出去什麼都不行，所以我只看到的是還是學業，我沒有看到他身邊的問題。我跟我先生一直覺得說他一定至少要把高中念完，對，但是我覺得他的問題已經不是在念書的問題，但是我們看得都還很表面……我很容易用舊的方式、舊的思維，還受限於現在的學制和一般的觀念來看待我的孩

子，我沒有辦法跳脫說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陪伴他或要求他，我好像自己就是已經被這個鎖住了、已經限制住了，我自己都沒有辦法突破」（KF6）。

肆、結論

一、親子關係的實況與子女期待有落差

綜合上述的子女期待內容包括渴望父母關心、了解、肯定和安全感、渴望陪伴、渴望傾聽、理解與學習好好溝通、渴望父母調整期待，這些項目其實都是包含在「支持型」的親子關係內涵，「支持型」指涉的是讚賞、鼓勵、接納、尊重與愛。但現實生活中本研究的青少年在他們未涉毒之前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六位是疏遠型，二位衝突型，二位支持型；而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五位矛盾型，二位疏遠型，一位衝突型，二位支持型。也就是支持型的親子關係是少的，父親偏向較疏離，母親則是偏向與孩子高支持與高衝突的矛盾關係。這個研究發現與張淑慧與張文賢（2019）的研究一致，他們發現多數用毒兒少與父親較疏離，父親無力管教時會表現無所謂與不關心子女，甚至究責母親放任，而母親在受責難中無所依靠，培養出與用毒兒少相互依賴的關係。親子關係的實況與子女期待顯然是有很大的落差，也造成親子之間的痛苦與折磨。

二、父母難為：管教方式需要持續調整與學習

本研究的家庭在管教方面，父親的管教方式有六位是疏忽式，二位獨裁式，二位權威式；母親的管教方式五個是疏忽式，三個是獨裁式，一個權威式，一個縱容式。**疏忽式的管教是本研究的父親與母親共同出現較多的管教模式**，疏忽式的管教是指少溫暖、低管束，少與孩子相處，不太教養子女。本研究第二類常出現的管教模式是**獨裁式管教**，少溫暖且高管束，對子女要求較高，常懲罰子女，要求服從命令，卻不解釋，控制子女，給極少的溫暖。本研究的結果與Calafat等人（2014）在歐洲的大型研究一致，該研究發現**疏忽式教養和獨裁式教養有較高比例的菸草和非法毒品的使用**，且獨裁式教養的酒精使用比率高於疏忽式教養方式。獨裁式教養雖然在華人的父權主義下司空見慣，但當與物質使用風險有關時，還是得盡量避免，調整管教方式。

父母的角色與親職的履行是需要學習的，Simons等人（1991）指出管教信念與父母親的嚴厲管教方式有顯著相關。父母親所持嚴格、體罰的信念與嚴厲的管教方式之間有高相關，尤其又以母親的關係較強。由於管教信念影響管教方式，父母需要重新被教育。也需要調整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與互動模式（Steinberg & Silk,

2002）。青少年會挑戰父母設定的界限或抗拒父母權威，對父母出現既親且離的矛盾情緒（Bloom, 1980）。然而，青少年時期與父母之間的衝突頻率與強度似乎會隨著年齡而有明顯變化（De Goede et al., 2009），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將不斷調整，漸由上下垂直的不對稱關係，逐漸變化成水平而對稱關係（Collins & Steinberg, 2006）。

父母管教子女的方式常會影響親子的關係，父母應該隨著子女的成長而調整彼此對待的方式，親職能力的提升需要很多的學習，Sandler等人（2010）強調親職教育的品質可以有效預測青少年核心素養發展與問題行為，形成保護的機制。強化家庭功能和父母的親職能力，特別是監督能力，能有效幫助青少年中止物質濫用（Estrada et al., 2017），建議社安網的推展，可以在家庭支持與家庭服務的策略上繼續強化親職教育，鼓勵建立支持性的親子關係，迴避疏忽式與獨裁式的管教模式，讓家庭成為子女安心的港口。

本研究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的受訪者皆居住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研究結果的可遷移性有所侷限，且物質使用青少年之樣貌多元，家庭經濟與親子關係也各異，難以一概而論。本研究只選擇K他命使用者，未能涉及其他類型藥物，研究結果較難解釋一二級毒品以及中老年物質施

用者的家庭關係，本文僅拋磚引玉，盼日後能更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物質濫用、親子關係、管教、家庭

參考文獻

- 吳齊殷、高美英（2001）。《台灣青少年藥物使用相關信念、態度與行為的長期研究》。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
- 李美枝（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9，3-52。
- 周玉慧（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7（1），67-89。
- 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2010）。〈當中年遇到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與父母中年生活感受〉，《台灣社會學》，20，1-37。
- 周思源、李玫姿、梁文敏、張麗惠、郭憲華、賴璟賢、朱日橋、郭憲文（2006）。〈台灣地區在學青少年藥物使用行為與其家庭型態特性之相關性〉，《中臺灣醫學科學雜誌》，11（4），243-251。
- 程玲玲（1997）。〈海洛因成癮者的家庭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0（2），45-65。
- 楊士隆、曾淑萍、戴仲峰、顧以謙、陳瑞旻（2017）。〈2016臺灣校園學生非法藥物使用之盛行率調查研究——以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為例〉，《藥物濫用防治》，2（3），1-12。
- 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現代華人的家庭文化特徵：以臺灣北部地區若干家庭的探討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5，141-195。
- 蘇詠絮、張滿玲、鍾昆原（2013）。〈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從辯證觀看華人成年初期的子女對父母的自我揭露〉，《應用心理研究》，58，15-65。
- Aquilino, W. S. (1994). Later life parental divorce and widowhood: Impact on young adults' assessmen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4), 908-922.
- Bahr, S. J., & Hoffmann, J. P. (2010). Parenting style, religiosity, peers, and adolescent heavy drinking.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71(4), 539-543.
- Baumrind, D. (1991).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1), 56-95.
- Calafat, A., García, F., Juan, M., Becoña, E., & Fernández-Hermida, J. R. (2014). Which parenting style

- is more protective against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Evidence within the European context. *Drug & Alcohol Dependence*, 138, 185-192.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 1111-1119.
- García, F., & Gracia, E. (2014). The indulgent parenting style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South European and Latin-American countries. In Selin, H. (Ed.). *Parenting Across Cultures: Childrearing, Motherhood and Fatherhood in Non- Western Cultures* (vol. 7, pp. 419-433). Springer.
- Im-Bolter, N., Yaghouh Zadeh, Z., & Ling, D. (2013). Early parenting belief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language.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3(12), 1811-1826.
- Kazemi, A., Ardabili, H. E., & Solokian, S. (201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competence in adolescents and mothers' parenting style: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on Iranian girls.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7(6), 395-403.
- Lamborn, S. D., Mounts, N. S., Steinberg, L., & Dornbusch, S. M. (1991).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62(5), 1049-1065.
- Montgomery, C., Montgomery, C., Fisk, J. E., Montgomery, C., Fisk, J. E., Craig, L., ... & Craig, L. (2008).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on the propensity for illicit drug use: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warmth and control. *Drug and alcohol review*, 27(6), 640-649.
- Simons, R. L., Conger, R. D., Whitbeck, L. B., & Wu, C. I. (199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arsh paren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159-171.
- Simons, R. L., Conger, R. D., & Whitbeck, L. B. (1988). A multistage social learning model of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and peers upo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Drug Issues*, 18, 293-316.
- Steinberg, L., Lamborn, S. D., Darling, N., Mounts, N. S., & Dornbusch, S. M. (1994). Over-time changes in adjustment and competence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65, 754-770.
- UNODC (2009). *Guide to implementing family skills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drug abuse prevention: Vienna: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prevention/family-guidelines-E.pdf>
- Wolfe, D. A. (1987). *Child abuse: Implica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Sage.
- Wu, P., Robinson, C. C., Yang, C., Hart, C. H., Olsen, S. F., Porter, C. L., Jin, S., Wo, J., & Wu, X. (2002).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others' parenting of preschoole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6, 481-491.